



五排第三个

1

我常听说，人们疼爱孙孙往往甚于自己的儿女。我不相信……但事实的确如此。这也许是因为我们得孙多在晚年，这时已不怕病痛和死亡，而只怕孤独的缘故。

莉莎就是在我年近六十岁那个时候出世的。我的儿子沃洛佳和他的妻子克拉娃以前就打过招呼，说是因为有我在身边，他们才迈出了这样大胆的一步，不然，还下不了决心呢。把莉莎抱回家的时候，沃洛佳和克拉娃说，他们把孩子的命运全部托付给我了。再说，我在学校里还教过三十五年书。

“我们在这么小的时候，谁都没有受过教育家的管教，”沃洛佳对我说。

克拉娃同丈夫的意见一致。

莉莎刚满一周岁，沃洛佳和克拉娃就出外发掘古物去了：在某地又发现了一座古墓。他们的职业不是研究未来，

而是考察久远的过去——这两口子都是搞考古学的。因此，莉莎由我来照应也就成为理所当然的事了。

我懂得，我的孙女应该比她的所有同龄人说话都早，比所有别的孩子早学会认字，也要比别人早了解周围的事物……因为儿子曾暗示过，我本身可以退休，可我的教育经验则不然。

克拉娃同丈夫的意见一致。

他们坚决认为，这三十五年积累下来的一大套经验都应该一股脑儿地用在莉莎这个小可怜儿身上，并且还要取得惊人的效果。

然而，我的经验却同莉莎的个性发生了冲突……

对她确实有个性这一点，我心里马上就有了数，因为她从来不爱哭。即便在她感到疼和湿得难受的时候也都闷声不响！这样一来，也就外加了许多麻烦。

当孙女三岁半的时候，我跟她解释过：莉莎——这不是大名，大名听起来又响亮又体面，叫伊丽莎白。从那以后，叫她莉莎，她就再也不应声了，干脆来个不搭理。于是我就说服孙女，告诉她，用伊丽莎白这个长名字称呼她这么个小孩子怪别扭的，人家要笑话。

“就让他们去笑话呗，”她说。

我又对她解释，伊丽莎白这个名字不同父名联起来叫，压根就不行，因为过去用它称呼女皇^①时才不带父名。从此，莉莎便摆出了一副女皇的架势。而我呢，每逢她的父母

① 伊丽莎白·彼得罗芙娜——俄国女皇，彼得一世的女儿。——译者

从某个大墓穴和古墓那儿打电话回来的时候，就向他们报告说：“伊丽莎白在睡觉……伊丽莎白在坐便盆……”

孙女获得了生平第一次胜利。

我房间里的桌子上方挂着几张班级合影。我在这些班里教过文学和俄语课，同时还担任过其中一个班的班主任。这些照片上第一排的人都半卧着，第二排的人坐着，而第三、第四排的人则往往站着。无论是半卧着的，坐着的，还是站着的，脸部表情都显得老成而拘谨。这也许是因为老师们在场的缘故，他们通常都坐在第二排的当间儿。

伊丽莎白喜欢用手指头在照片上一个一个指着问：“这是谁呀？这个呢？……”

由于脑动脉硬化症的主要特征是不久以前的事记不清，而很久以前的事则记得很牢，所以我马上就能叫出我从前的学生的姓名。

惟独有一张照片上是五排人……一个在黑白照片上看起来分明是浅色头发，而实际上却是火红色头发的小伙子与众不同，脸上带着笑容。他就站在那个第五排的左数第三个位置上。

我早就对孙女说过，这是瓦尼亚·别洛夫，挨着他的是她爸爸。那一天瓦尼亚硬说，他能站在两张摞在一起的凳子上。因此才增加了一个其他照片上都没有的第五排。

伊丽莎白的爸爸也跟着他的朋友站了上去，摇摇晃晃地站在那张摞起的凳子上。这对他来说特别不容易，因为他生来右腿就有点儿瘸。总想高人一头的谢尼亚·戈卢勃金也差点儿没从凳子上摔下来。

可瓦尼亚·别洛夫在照片上却是笑呵呵的。

他是我那个班上的一个捣蛋鬼。我把瓦尼亚所干的一桩桩坏事都讲给伊丽莎白听了，好让她一辈子也不去干这类事。

一次，瓦尼亚·别洛夫当着一街人沿着三层楼的墙檐走到了我们教室的窗口，并且说：“可以进来吗？”

“怎么会出这种事呢？”校长当天就问我。

“瓦尼亚·别洛夫……”我回答说。

还有一次，他宣布绝食……他认为，我给一个学生打了两个两分不公平。瓦尼亚在课间休息的时候走到我跟前，低声说：

“薇拉·玛特维耶芙娜，您在课上问的是没有给我们留过的作业。”

“可是，就连我留过的他也掌握得……不好。”

“掌握得不好？也许……但是也不能就为了这个给打两分呀。”

“分数已经记在班级日志上了。”

“可以把它改过来嘛。”

“不行！”

“您应该改。”

“绝对不行……”

“那么请原谅，薇拉·玛特维耶芙娜，那我可就要抗议了。”

“怎么抗议呢？”

“宣布绝食！”

我笑了笑，甩了甩手。

那天，他果真没有到食堂去吃饭。我查问过，确实没有去。第二天还是没去……

“绝食了吗？”我装着满不在乎的样子问他。

“绝食了，”他回答。

“你还打算……饿多久呢？”

“直到您把两分改过来……”接着，他往四下看了看，又小声加了一句：“您甭担心，还没人知道哩。不然的话，学校食堂要关门的！”

晚上，我走访了瓦尼亚的家长。

别洛夫的家就在学校旁边，只隔一条马路。

幸好瓦尼亚本人没在家。两位和蔼可亲而又腼腆的家长显得忧心忡忡，十分不安。在他们身上既没有瓦尼亚的那种坚决果断，也没有他那股调皮劲儿。

“出了什么事啦？”母亲提心吊胆地问道。“他在学校……惹什么祸了？”

“请别着急。”

“哪能不着急呀？他是我们的命根哪……”

在屋子最舒适的地方摆着一张桌子，上面放着瓦尼亚的书包（我立刻就认出来了！）、作业本和书。桌子上方挂着一张课程表。此外，还有他站在五排第三个位置的那张照片。

“你们放心吧，”我说。“他学习不错，已经被选拔参加校外数学竞赛啦！”

“谢天谢地！”母亲说。

• • •

我这才鼓足勇气问：

“请问，他……吃饭吗？”

“不吃呀……”瓦尼亚的妈妈惶恐地说。“只喝水……一口面包都不吃。我问：‘是不是闹肚子了？’可他说：‘不想吃！’都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

我想：“看来他是非强迫我答应他不可了！”于是，第二天我便当着瓦尼亚的面把那个学生的两分改成了三分。

“为什么呢？”当我把这件很久以前的事从头到尾讲给已是六岁的伊丽莎白听了一遍之后，她问道。“你是怕瓦尼亚饿死吗？”

“我把那个学生的两分改成了三分，”我重复了一句。

不过我并没有告诉伊丽莎白，那个学生就是她的爸爸。

2

是的，沃洛佳在我那个班上学习。事情就是这样……校长劝我当六年级三班班主任时说：

“别再推辞了吧！这都是偏见，谁会说您偏心呢？”

我答应了。后来，我连续三年证实了校长所说的那种谁也不能怀疑的不偏不倚。无形中这已成为我在教育学生的工作中须要着重注意的一个问题了。我非常认真……要让人人看到，我对自己的儿子是严厉的，既不迁就，也不纵容。我至今也不明白，沃洛佳当初是怎么忍受过来的。

没有一本教育著作里说过，假如就在教师的眼皮底下，

就在靠窗的第一张课桌后面坐着的是自己的儿子，那么他应该怎么办。

沃洛佳所以坐在第一张课桌，就因为他喜欢坐最后一张课桌。

我总是拿他的作文作例子向全班讲解，哪些语法和词义上的错误是最典型的。我常让他长时间地站在黑板旁边，叫他库德里亚夫采夫，虽然对其他同学我一向只叫名字。

结果我还是把他突出出来了。当然这是从反面的意义上说的……

在文学课上沃洛佳只能答好不能答坏。但有一次，我发现儿子在课堂上胡诌一气，便对他提了一个在学校里没学过的生疏的问题。沃洛佳没答上来，于是我就大声地对他，确切些说，对全班宣布：

“库德里亚夫采夫，两分！……”

就为这个，瓦尼亚·别洛夫宣布了绝食。

“要时刻记住，你是我的儿子！”我告诫沃洛佳。“你要正确理解我……”

他记住了，理解了，所以没有觉着委屈。但瓦尼亚·别洛夫不想理解！他打乱了我处理我同我儿子兼学生之间相互关系的计划。统统打乱了！

我对沃洛佳说，他不应该单单对历史和古老的陶瓷碎片感兴趣。我告诫他，数学测验的时候不准交头接耳或是打小抄。

然而，瓦尼亚·别洛夫却对我儿子说什么数学对他来说一辈子都用不上，并且在测验的时候照旧和沃洛佳一道几分

享自己的数学才能。

我开导沃洛佳说，数理化对于每一个人的智力锻炼都是必不可少的。可瓦尼亚随后却对他说什么正常人每天锻炼二十分钟就够了，这儿可倒好——又是上课又是考试，哪儿是什么锻炼呢？

我发现，注视着我和儿子之间关系的除了瓦尼亚之外还有一个人，这就是谢尼亚·戈卢勃金。

往往有这样一种人，他们看到您穿上了新衣服，不是祝贺您购置了新装，而是说：“一个劲儿地打扮……打扮起来没个完！”看到您休假回来，他们便摇着脑袋说：“老是休息……休息起来没个完！”看到您的气色不错，则拿腔作势地说：“哎呀，真是容光焕发呀！……”谢尼亚·戈卢勃金的一举一动都使我想到了这种人。谢尼亚·戈卢勃金怀着病态的心理对待别人的成绩，他处处觉得别人是在谋私利和搞特权。如果有谁病了，谢尼亚就说：“准是……想歇歇啦！”如果谁的课下作文得了五分，他就要问：“怎么回事呀？是爸爸妈妈卖的劲儿吧？”

对谢尼亚来说，明确表达某一个思想纯属活受罪。所以他恨文学课，同时捎带着把我也恨上了。

同学们把戈卢勃金叫做“乌鸦”，因为他总象是在教室上空盘旋着，对所有人都心存猜忌，疑神疑鬼。

他疑心我对儿子偏心。

每当沃洛佳瘸着右腿上黑板的时候，戈卢勃金就用猜疑的目光盯着他：看他是不是在装模作样？会不会是在为个人捞取什么特殊待遇？

再难找到比瓦尼亚和谢尼亚两者之间更为不同的人了，然而他们俩都把我本来就够为难的处境弄得更复杂了。

当我教导班上的学生要品行端正时，我从谢尼亚的眼里就能看出，他巴不得沃洛佳会有什么越轨行为。这样，谢尼亚便可以把他早就暗暗准备好的一句话说出来了：“还是先把您自己的儿子教育好吧！……”

我自己也生怕沃洛佳的行动同我的说教和训导两相抵触。结果我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八年级三班就要进行数学测验了。解答复杂的几何题对于我的沃洛佳来说就象谢尼亚·戈卢勃金区别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一样的费劲儿。

那天早晨，沃洛佳准备上学去的时候，只盼着数学老师出点什么意外。自然，我对他说：这样想太不近人情了。

“比方说，就让她在哪个地方耽搁上十五分钟。城市里啥事碰不上！到那个时候再想测验也就来不及了……”

“你不是都学过了吗？”

“学了也不管用！”

这位数学老师是我们学校里少数几个爱漂亮的女教师中的一个。她常常是等大家都离开教师休息室以后，赶紧对着镜子打扮一番，最后再挑剔地打量一下自己的脸庞和发型，直到她确信哪儿都没有毛病了，才急急忙忙地去见高年级学生。

那一天，她照例耐着性子等到教师休息室的桌子上最后一本班级日志不见了，然后便走到了镜子跟前……

就在这个时候，她被锁在了屋里。有人从门外走廊里拧

上了钥匙。结果沃洛佳也就如愿以偿了：数学老师耽搁了。

直到过了二十分钟以后，来打扫走廊的清洁女工才听到了轻微的敲门声，这是因为数学老师不喜欢把事情张扬开来。

测验就此告吹了。

我明白，谢尼亚·戈卢勃金的时运到了！

在审理这一“案件”的过程中，数学老师不愿意出场。她长得漂亮，所以不需要辩护。此外，她就是再倒霉也不愿被人讥笑，而眼下这种危险是很大的。

“库德里亚夫采夫，我请你说说，你怎么竟干出这种事来！”我说话时，两眼看着谢尼亚·戈卢勃金。

他的目光里并没有得意的神色，有的只是惶惑不安。既然我在主动责备儿子，那么他还能说我些什么呢？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从后面课桌传来了瓦尼亚·别洛夫的声音：

“关沃洛佳·库德里亚夫采夫什么事？是我锁的门。”

“你……怕数学测验吗？”我诧异地问。

“关心集体嘛！”瓦尼亚·别洛夫答道，说罢便坐下了。

谢尼亚·戈卢勃金的眼睛里流露出失望和烦恼的神情。

“瓦尼亚，你必须向……伊琳娜·格里戈里耶芙娜赔礼道歉，”我不知所措地说。

“可我锁门的时候，招呼了她一声：‘请原谅！’”

“她没听见。再说……我现在没心思开玩笑！”

“我也是，”瓦尼亚·别洛夫说。

“快！去认个错……当面认错……（数学老师可不乐意演这种戏给大家看。）别洛夫为之这样干的那些人也应感到惭愧！”我又瞧着谢尼亚·戈卢勃金说。

当天，校长问我：

“怎么，又是瓦尼亚·别洛夫吗？”

“是的。不过是从另外一种角度……”

“该采取措施了！”

“是啊！”我说。

等到学期结束以后，我同沃洛佳一起转到了另一所学校。学校离我们家较远……但这样离瓦尼亚·别洛夫也远了一些！

一年之后，我们索性搬到市区的另一头去住了。事情就是这样。

3

从前我觉得，构成人类半数的女性，也曾包括我在内，并不那么富有幽默感。可是孙女伊丽莎白却常常把我这种观点否定掉。

她动不动就要我把瓦尼亚·别洛夫很久以前的所作所为讲给她听。这些事在经过多少年之后的今天，仍然使我这个多年从事教育工作的人暗暗吃惊。可伊丽莎白听着听着，却倒在沙发上，笑得前仰后合。

不知她从哪位大人那里学到了一句没大没小的口头语“喂，我说！……”而且差不多每一句话都是这么开头。

“喂，我说！”她预先就往沙发上一倒，说道。“就那么直接爬到窗口的吗？就那么张口就问：‘可以进来吗？’”

“就是那么样……可他就想想，要是从三层楼上摔下去可怎么办！他做事向来就欠考虑。”

“他既然想出了爬到窗口的主意，怎么能说他欠考虑呢？”

六岁的伊丽莎白想起事来倒蛮有逻辑性。

“他根本就不管别人是否还得给他担责任，”我解释说。“他只顾他自己，只顾他的那些鬼点子。”

瓦尼亚只有一件我觉得是最主要的过失我没有对伊丽莎白讲过，也没有同其他任何人讲过……

孩子们通常要求一遍又一遍地给他们读他们所喜欢的书，反复地给他们讲他们爱听的故事。而伊丽莎白则对瓦尼亚·别洛夫的恶作剧百听不厌。

有一次，我家请客，大家都入座了，当沃洛佳站起身来祝第一杯酒的时候，那架老式衣柜的柜门慢慢地敞开了，伊丽莎白从衣服堆和满是卫生球味的柜子的尽里头钻了出来。她环视了一下哑然无声的客人们，说：

“可以进来吗？”

这就是我总讲瓦尼亚讲出来的结果：伊丽莎白简直爱上了他！

不过也可以认为，似乎她生下来以前就和瓦尼亚结下了缘分。说来也凑巧……伊丽莎白比产期早出世半个月，恰好是在她爸爸生日那一天出生的。因此沃洛佳的朋友们都不约而同地开着同一个玩笑：“要是所有当妻子的都给她们的丈

夫送上这么一份礼物就好了！”“一天过两个生日——真是妙极了！从节约的观点……”

看到新生儿长了一头黑发，我高兴极了。

“纯属我们库德里亚夫采夫家的血统！”我得意地喊道。“将来准是个扎着黑辫子的小姑娘。”

可不料想，半年以后，她的头发变淡了。

她的身体素质非常奇特而危险：好多种药物不能用。

“过敏反应，”当伊丽莎白由于用了一片阿司匹林全身出满了斑疹的时候，大夫对我们说。“也许还要恶化……比如水肿。眼睛、脸部也可能肿起来。”

人们都靠药物治疗，可伊丽莎白却因服药而害病！

她身上的鲜明个性太多了，所以我和沃洛佳、克拉娃只好借助集体力量来对它们加以约束。尽管她的父母依旧对我的教育经验寄予希望，可我们还是把伊丽莎白送进了幼儿园。

起初，保育员和小伙伴们都不叫她的大名。但是，名字就象一个小姑娘似的幼儿园主任阿廖娜反倒说，这种长名字能给她很多约束，并激起她的责任感。于是，伊丽莎白女皇依然有位。

有一次，伊丽莎白从幼儿园回家以后不肯吃晚饭。

我问她：

“你不饿吗？”

“我没有吃午饭，”她说。

“你觉得肚子不舒服吗？”我焦急地问。

她病不得，因为不能吃药。

“我没有生病……我绝食了！”

“你？！”

“还有一个小朋友呢。”

“你们俩宣布绝食啦？”

“今天早上。”

我明白了：瓦尼亚·别洛夫从我们家又跑到了她们的幼儿园。

“你们到底是因为什么……要绝食呢？”

“阿廖娜要走了。”

我素来喜欢漂亮的女人，就象喜爱杰出的艺术作品一般。不过幼儿园主任并不象艺术作品那样一成不变。她一方面时刻保持着她那异常温柔的性格和女性美，一方面又随着场合的不同而不断变化。她从不对孩子们发火，因为她天生就爱孩子。然而她却常常批评家长们。不过她的批评是那样温和而富有魅力，以至大家都心悦诚服。特别是父亲们……他们渐渐地对学龄前教育问题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而在家里他们则开始争夺早晚到幼儿园接送孩子的权利。于是阿廖娜的头上慢慢地聚起了乌云……

有一位孩子的妈妈记得，阿廖娜到幼儿园来纯属“偶然”。她是在文化宫庆祝枞树节以后被请来当主任的。节日那一天，圣诞老人病了。担任群众娱乐活动指导员的函授大学学生阿廖娜把可怜的“老人”患脊神经根炎的事告诉了孩子们。她讲得是那么激动，致使不少孩子都哭了。

后来，阿廖娜对我说：

“他们应该会哭……不只是在自己磕破膝盖的时候，而且当别人的膝盖疼痛的时候也是一样。”

根据阿廖娜的建议，孩子们给圣诞老人写了一封信。然后她就同他们一块儿玩开了。

沃洛佳和克拉娃那个科研所的工会主席注意到了阿廖娜。这是个戴着一副旧式夹鼻眼镜、稍有些驼背的女人，她能背诵全部新歌，还是个一级象棋手。是她把阿廖娜请到幼儿园来的。

原来这位工会主席不仅在棋盘上，而且在幼儿园的家长会上也善于鏖战。

母亲们全力展开了攻势。

“她是个群众文娱指导员！”其中的一个妈妈说。

“带孩子可不是过枞树节，要对他们进行教育！”另一个帮着腔。

父亲们很想出来为阿廖娜辩护，但拿不定主意，因为怕适得其反。

只有两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投入了反击：工会主席和我。

“你们去问问你们的孩子吧！……”我喊道。“看他们乐意不乐意让阿廖娜走？”

“孩子们懂什么？！”

“可别这么说！”工会主席正了正夹鼻眼镜说。“记得我小时候……那时候我看人可比现在清楚得多。很难骗过我！”

接着我又站起来说：

“请相信我的经验，我在学校里工作了三十五年。”

“那就请您来当好了！”

“不，学校教师和托儿所保育员天赋不同。”

“天赋不同？”

“这就好比文学里的……诗人和散文家！两者都是作家，但作品体裁各不相同。”

“她样样都行！……”工会主席附和道。“能歌善舞，还会朗诵诗……再说，她把孩子们的饮食照料得多好哇！”

这时我又站了起来：

“可现在我的孙女已经两天不吃东西了。吃不下去。”

“要是只她一个人吃不下倒好说了……”一个女人挖苦道。

“是的，孩子们喜欢漂亮的老师、漂亮的保育员！”工会主席从座位上跳起身来说。“这能培养孩子们的美感。”

“如果只是孩子们喜欢也好说！……”那个女人又说。

我又站了起来，并带着瓦尼亚·别洛夫那股不顾一切的劲头儿说：

“你们不要怕她嘛！”

“您说起来倒轻巧，”在回家的路上一个妈妈冲我说。

“您的儿子和儿媳都在外地掘古墓……”

阿廖娜仍旧留在了幼儿园。

过了两天，她突然给我打来一个电话：

“薇拉·玛特维耶芙娜，您别着急……不过，请您马上来一趟！”

“出了什么事？”

“我们的医生出外开会去了。可伊丽莎白发烧了。我给她吃了药……我早应该知道的！早应该……薇拉·玛特维耶

芙娜，您不该为我说话！我叫了急救车，别着急。请原谅！别着急……”

4

每个人的生活中都有一些把往日的不幸渐渐看得十分淡漠的时刻。

孙女立刻被送往医院，是我同她一起去的。车开得很快，径直朝着红灯飞驰过去。

医院距离沃洛佳曾经学习过，我也在那里教过文学和俄语课的那所学校不远。我们早在战前就从那个区迁到城市的另一头去了。但是，生活在这个危难时刻不期而然地又使我回到了那里。

我想：“怎么会是这样呢？多么奇怪的巧合呀……难道城里的医院还少吗！”巧合……在生活中俯拾皆是，然而，深深铭刻在我们记忆中的仅仅是那些带来欢乐或不幸的巧合。

文学课上，同学们常常对受伤的安德烈·波尔康斯基和阿纳托利·库拉金躺在两张并列着的手术台上^①感到惊奇。我解释说，生活经常使我们碰到一些在最大胆的幻想小说里也读不到的巧合和意外。我甚至还用个人生活中的一些实例来加以证实。

我想：“看，又是一个巧合！又是手术台……”

① 列·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中的情节。——译者